

「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」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

蔡文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
戰前中日兩國之間的和平，長期以來有賴於中方的委屈求全。只是在經歷 1930 年代多次的大小紛爭之後，原本為了找尋一名演習失蹤的日本軍人而引發的中日兩軍衝突事件，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情勢之下，發展成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。此一戰爭不僅影響了日後中國的發展，也凸顯了國共兩黨複雜曲折的關係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，假該所檔案館舉行「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發表臺、日、中三方學者的研究成果。



與會學者：（自右上逆時針）張玉法院士、呂芳上館長、楊天石研究員、波多野澄雄教授、王建朗所長、黃自進研究員（攝影／江佳威）

開幕式由該所所長黃克武主持，之後由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發表「毛澤東為什

麼感謝日本侵略」的主題演講，從毛澤東於 1964 年接見日本社會黨佐佐木更三等人時，親口感謝日本侵華以使其能奪得中國國民黨政權之談話切入，透過《蔣中正日記》來重新審視蔣氏對此情勢的看法，並建議思考戰時中共發展之思維，需納入二階段革命、締造國中之國、成為敵後民族代言人等因。

專題演講畢，進入大會討論議程。戰前研究部分，林志宏〈戰前中日學術交流的一側面：「滿蒙」課題及其論爭〉一文，分析戰前日本藉由中日雙方從學術思想對滿蒙的重新理解，以達到分化中國的目的。至於黃自進〈蔣介石的對日戰略：以反共為結盟訴求的探討（1933-1935）〉與李君山以〈從「親英聯美」到「聯蘇制日」——1937 年孔祥熙出訪之探討〉二文的立論基礎是滿洲國成立後，中國必須選擇與日本反共結盟妥協，或仰賴蘇聯來牽制日本。前者的內容在分析蔣氏鑑於日本政軍對華政策的不同調，以反共結盟為訴求，爭取日本外交系統等政府奧援，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等，抵制關東軍的華北獨立計畫；後者則說明蔣氏希望透過孔祥熙訪英團來建構中英同盟，抵制英日和談，然英國以中立立場加以回應，使蔣氏放棄親英聯美的努力，而走上聯蘇制日的道路。

伴隨國民黨在 1930 年代統治基礎的擴張，蔣中正面對強大的日本，需要更強化中央集權，金以林與張瑞德分別從人材與組織

運作兩方面切入。金的〈蔣介石與政學系〉一文，即探討蔣氏如何容納並利用不同性質的人所形成的「政學系」，提供蔣氏關於黨國的政治設計與人事意見，以及協助蔣氏與黨外、中共的溝通交流，處理國際交涉和財政金融等難題。張的〈侍從室與戰時中國的黨政決策（1933-1945）〉，則從「侍從室」角度出發，透過各項重大事件的參與過程，說明國民黨從內部文書作業、組織運作等層面著手，試圖達到集權中央的目的。

至於日本如何面對戰爭的問題，戶部良一的論文〈日本陸軍の中国共産黨観：1926~1937〉，思考日軍早期如何透過廣州武官磯谷廉介與佐佐木到一理解中共。曹大臣則分析日共創始人佐野學對共產與中國革命運動的思想變遷，而撰寫成〈佐野學關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觀察與思考（1922-1937）〉一文，來說明中共領導階層的變化。劉傑的〈外交官と对中国政策構想：1935 年を中心に〉，探討日本外交官對中國的觀察，決定日本未來選擇合作對象時的方針，並提出外交系統與軍部之間差異，在於外交官想透過政黨派系而非武力來控制中國。森靖夫〈国家総力戦としての日中戦争〉一文則分析負責國家總動員業務，以時任陸軍省整備局長山脇正隆所寫的〈北支事變備忘〉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），來論述影響日本設定總體戰的因素。

其次為戰時研究部分，軍事方面，經盛鴻〈中國地理與國共抗日軍事戰略論析〉一

文，指出 1937 年進入中日戰爭後，中國面對優勢的日本，國共高層依據中國國土遼闊的地理特性，採持久消耗戰與運動戰的戰略，來呈現地理與戰爭的連動關係。不過有鑑於戰爭史未參考原檔與抄錄編纂戰史之弊端，林桶法的〈國共報紙對長沙會戰的敘述——兼論抗戰史研究的一些問題〉，因而提出運用當時報紙的史學方法，以《中央日報》與《新華日報》對長沙會戰的描述中，解讀國共合作抗日時，戰役報導之異同，突顯出歷來軍事史的侷促。王奇生則運用日記為研究題材，撰寫〈抗戰時期國軍的特質與困境——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〉一文，論述至戰爭末期，國軍因物資貧乏與徵兵制度的不完整，導致中國在軍事上面臨困窘，呈現資料研究的新面向。

中日戰爭期間除國共一致抗敵外，亦是兩黨尋求發展的契機。戰時中共勢力逐漸擴大，為此時期的最大特色，亦是學界論述關注的焦點。黃道炫的〈抗戰初期中共在華北的進入和發展〉，與楊奎松〈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敵後農村的較力——以晉東南敵後農村中國共力量消長為考察對象〉一文，分別從華北和晉東南地區的個案研究，來說明中共深耕敵後的情形。前者強調華北快速發展與戰爭情勢發展，闡述中共成功統一戰線與其群眾政策有密切相關之處；後者分析當地農民著重共黨之主要因素在於道德理想層面，以及堅持不懈解放農民之努力。

而中國國民黨方面，原本採行以黨領政

的方針，但中日戰爭的爆發，打亂了訓政過渡憲政的規劃順序。西村成雄〈中華民國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·國民參政會——從「黨治」到「憲政」的摸索〉一文，提出中國國民黨為整合全國資源而設置國民參政會，除影響中國國民黨之外，還對戰後國家與政府的布局有所關連（即「五五憲草」規劃），亦使毛澤東對戰後中國的構想產生某程度之影響。至於該黨在戰爭期間各地發展或國共對抗，則有四川、浙西、香港、青海、臺灣等個案。陳紅民的〈抗戰期間蔣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述論〉，即以四川治理問題作為主軸，論述蔣氏為有效地加強控制四川，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模式，來遂行其意志。張力的〈抗戰勝利前夕的國共浙西之戰〉，透過浙西戰事來說明長江流域中國國民黨的勢力變遷。香港問題部分，李盈慧〈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在香港的競爭與合作——兼論宋慶齡的角色〉一文，藉由國共在港澳黨務工作雙方的競爭關係，他們與宋慶齡和宋子文雙方以保衛中國同盟會作為合作之虛偽假象，論述香港淪陷前後兩黨的競爭與合作模式。吳啟訥的〈在信仰、民族、國家與政治之間——1930~40 年代青海馬家軍與西藏、中共、日本及蘇、蒙的軍事衝突〉，透過青海馬家軍從清末民初至戰爭末期的演變，說明近代青海穆斯林面臨軍政勢力的雙重自我定位（合作與獨立）、雙重身分認同的傾向（保教與忠君）、政治立場與國家政局中的角色選擇（反共）複雜的現象。朱法

源〈從歷史相對性看李友邦與抗戰〉一文，以臺灣三民主義信徒李友邦，從聯俄容共到國共內戰所經歷中、臺、日的經驗，以說明歷史相對性之性質。

國際關係研究方面，探討來自蘇聯因素在戰爭期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該如何解讀，波多野澄雄以〈国共対立と日本——戦争末期の「容共」をめぐる葛藤〉一文，論述日本政府為改善日蘇關係，為避免蘇聯參戰，在戰爭末期思考與中共合作的可能性，產生「容共政策」與「對支新政策」，間接造成共黨勢力的增進。久保亨的財經思想面論文〈蘇俄在戰時中國：重慶國民政府經濟專家眼中的蘇聯經濟〉，則說明在戰爭初期，中國國民黨藉由對蘇聯經濟評價之提高，以冀望改變中國國民黨與蘇聯之間的關係，使得蘇聯對華之軍事援助得以發揮作用。

在戰後研究部分，外交策略如何佈局是戰爭末期的大事，林泉忠與陳謙平均以開羅會議為中心，討論戰後中國國民黨對亞洲的布局，前者的〈開羅會議與琉球問題〉一文，以琉球作為研究切入點，因日本因素而提倡未來由中美共管的建議，企圖造成琉球地位未定論的模糊空間；後者〈開羅會議與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重構〉說明中美建構戰後東亞新秩序，以及蘇聯因素的介入，遂使中美在建構東亞國際秩序的思維上產生變異。

論及戰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定位，蔣介

石在忙於對日抗戰之時，卻仍花費大量時間來撰寫與修訂《中國之命運》，以達立言之功。王震邦以〈蔣及幕僚日記中的《中國之命運》〉一文，呈現對此行為在蔣氏的日記中有反省記載，幕僚的日記中則記載著不同程度的保留，正反映出黨內不同意見。楊天石〈蔣何以邀毛，毛何以應邀？——以美蘇兩強與重慶談判的關係為重點〉一文，則著重在抗戰勝利後，國共面臨戰局收拾與百廢待舉之時，蔣氏邀毛澤東舉行重慶會談的過程中，美蘇兩強介入談判的歷程，顯示美蘇對中國外交政策初期的構想。鹿錫俊針對留用日人問題，發表〈日本因素在戰後中共控制區的地位與效用——以東北根據地為中心的一個考察〉一文，陳述中共從蘇聯手中獲取關東軍的武裝時就留用大批日人，之後為了在醫療衛生、軍工生產、軍事教育與空軍奠基等方面，留用的大批技術人員在中共東北地區勢力擴張時發揮作用。

以上各場討論會，各國學者均熱烈參與討論。閉幕前的綜合討論，由呂芳上、楊天石、張玉法、王建朗、波多野澄雄、黃自進主持。眾學者咸感本次會議足以引發熱烈討論，且具有創意與新穎之效，然而有些議題過去尚未深入討論，日後仍有重新思考的空間。總此而言，臺、日、中三方學者的合作，呈現了力求超越國界，突破意識型態，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尋求共識。